

# 立德树人双重视阈下文化心理结构的三维透视

——基于“两个结合”维度

范婷<sup>1</sup>, 戴生岐<sup>2</sup>

(1. 长安大学 工程机械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2.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为了落实新时代教育强国之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方法论要求,牢牢把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问题,基于现实重大问题导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唯有致力于纠正思想政治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空心化”问题,才能在顺利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上,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目的。研究表明,教师要在自我强化和内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信仰、夯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信念、焕发民族伟大复兴之信心的基础上,把构建学生基于普遍性的知、情、意心理元素三维整合的民族文化心理等边三角形结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才能让学生在“内化于心”中通过“明心立志”的中介“外化于行”;未来要把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成人之教”作为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体现中国特色的达者之教与正者之育统一起来,并通过“三全育人”的路径依赖,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心、中国情和中国味的主体世界。

**关键词:**教育强国;立德树人;“两个结合”;达者之教;正者之育;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5)04-0017-10

##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n cultural-psychological structure under the dual vi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FAN Ting<sup>1</sup>, DAI Shengqi<sup>2</sup>

(1. School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n building China into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ollows the “two integrations” framework, particularly adhering to the methodological imperative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nd firmly focuses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people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them,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them”, conducting research based on major real-world issues. The study finds that only by addressing the pervasive issue of “hollowing-ou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cultivating talent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be truly achieved on the basis of fulfilling the core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eachers must reinforce and internalize their faith in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solidify their belief i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gnite confidence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is foundation, they must tre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lturally-rooted psychological structure-modeled as an equilateral triangle composed of students’ universal elements of knowledge, emotion, and will-as the centr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ent phase. This structure enables students to “externalize in action”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clarifying the mind and strengthening resolve”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 within the heart”. Looking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al thought on “education for cultivating complete persons” should be adopted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n this basis, th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hat embod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amely, “educating for cultivating capable and enlightened persons” and “nurturing for fostering moral uprightness”-should be unified. Through the path-dependent logic of “three-aspect holistic education” (all-member education, whole-process education, and all-dimensional education), students can

gradually develop a subjective world imbued with Chinese values, sentiments, and cultural flavor throughout their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bas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wo integrations”; educating for cultivating capable and enlightened persons; nurturing for fostering moral uprightne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接班人。然而,当前的相关研究缺乏政治性和学理性相互统一的研究视阈,从而影响了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因此,在探讨立德树人双重视阈下文化心理结构的三维透视之前,需要对立德树人进行概念界定和背景梳理,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从而在“本义”与“他义”的基础上阐明本文的创新成果。

从“本义”看,立德树人包含“立德”与“树人”两个层面,前者指思想政治教育关键课程的“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后者指知识技能的传授和培育。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从政治性看,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提出是在新时代中国教育问题的整体性梳理上对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系统性和全局性的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其视为党之大计、国之大计,强调必须聚焦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来重塑教育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学理性上看,立德树人继承

了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的历史根脉,又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的时代精华,并表现为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

从“他义”看,也即从张岱年先生讲的“别人的研究”的维度看,近年来,立德树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立德树人内涵进行多维解读。学界把重点放在立德树人概念梳理上,但在条分缕析中囿于西方“概念思维”的窠臼,忽视了这一概念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的对“五育并举”的全面推进上有详尽论述,但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有所稀释;有的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维度理解立德树人,但忘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长必须依循“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得“不接地气”。二是在实践路径探索方面,普遍主张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以此构建全方位育人新格局,并强调师德师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创新,但忽视了对创新之“守正”基础历史的具体“含英咀华”和“沉浸浓郁”式的“慎思明辨”,学理性相对匮乏。三是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两个结合”的关系时,虽然认识到“第二个结合”为立德树人提供了根本遵循,但没有深入挖掘“第二个结合”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底蕴,显

得空疏而抽象。

除了上述研究中的偏颇和不足以外,就现实问题讲,在西方“政治并轨、文化重塑、线下渗透”的三管齐下“跑马占地”的消极作用影响下,个别莘莘学子和教育工作者自身具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局部坍塌,个别高校一定程度上存在人文生态失调和组织文化先进性衰减所导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空心化”问题,已成为我们必须直面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鉴于此,一是本文以立德树人之文化心理知、情、意等边三角形相统一的结构为分析框架,在回应现实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拓展了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综合多维理论视野。二是本文引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提出的“两个结合”方法论,特别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方法论,辅以学史、明心、笃志和力行的“三加一”之个人成长的历史逻辑过程,实现文化自信人格的再造和中国人历史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构,以此来积极回应《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和“培根铸魂”的要求和圆满纾解现实重大问题,这就是本文的创新点。

## 一、达者之教:思政育人主体 目标期待之维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sup>[1]</sup>可见,基于“第一个结合”放眼当下的视阈,熔铸和打造铁肩担道义,合力襄伟业的正者角色,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思想政治教

育首要的主体目标期待。“两个结合”是一个涵古概今的系统方法论,所以当下的正者之育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视阈中,就自然回归到达者之教的历史基座上。

### (一)达者之教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3 个社会角色的界定

纵观儒家文化传统不难看出,“成人”是谋事的主体前提。唯其“成人”,才能多谋善断,才能科学决策,才能开物成务。那么,成什么人呢,总而言之就是成为达者。儒家讲究德性的养成,成为达者,就是要在主体心灵秩序中,熔铸 3 个方面的德性养料,即仁、智、勇三维德性的育人资源。唯其如此,才能成为孔子眼中的达者。

“达”和“立”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孔子常常把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说,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sup>[2]</sup>。这实际上揭示了儒家的身教主义传统,即育人者必须率先垂范,做到学问和生活的一致、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讲,即“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sup>[3]</sup>。

儒家认为,达者的养成,关键在于自我自觉自动的修养功夫,“不愤不启,不悱不发”<sup>[2]</sup>,老师不能越俎代庖,必须循循善诱。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谛。通过自我养成,就可以三十而立了。立什么?就是立做人的道德原则。将其与儒家倡导的“八主德”的伦理规则,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比较,三达德是“大道理”,属于伦理准则,大道理管小道理。因此,三十而立,

主要是把最基本的做人伦理原则立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在待人接物中夯实通权达变的人性基础。这就是成为达者的养成论。

从社会角色上讲,成为达者,要具体化为3个角色,曰仁者、智者、勇者。仁者无忧,仁者爱人,仁者恻隐同情,仁者爱人利物也;智者不惑、君子上达,智者深思熟虑,智者多谋善断,智者难眩以伪也;勇者不惧,勇者乐险,勇者披坚执锐,勇者知难而进也。从现代心理学观照,仁者之心理活动偏在情感侧;智者之心理活动偏在认知侧;而勇者之心理活动偏在意志侧。同时,在三德养成中,儒家又以教育养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sup>[2]</sup>的“爱感优先论”作为首要目标。至此,儒家心目中的以利乐有情和仁爱德性为主参量的心灵秩序之等边三角形架构就算完成。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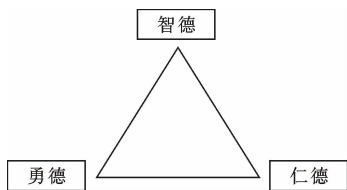


图1 三达德等边三角形结构图

## (二) 达者之教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生成

### 1. 达者之教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存在论基础的起根发苗

达者之教萌生于先周时期。梁漱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国度<sup>[4]</sup>。譬如,基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论观照,中国至迟在春秋时代,人们在祛魅过程就逐渐形成了达者之教存在论基础的初级版。具体而论,达者之等边三角形心灵架构

的存在论基础,就是外在于每一个“现实的个人”<sup>[3]</sup>的现实的“天-天子-民”这样一个具有闭环特征的王道正德的行政密码。如图2所示。在这个模式中,“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地上的“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他要以子事天。同时,这个“天子”又是民之主,他还要牧民治民。而地上的“民”,则是由天所生,虽然说“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但作为高高在上并替民做主的“天”以及“天子”,却不能因为害怕社会紊乱而无视人民的世俗欲望,最好的方式就是“法先王”,像大禹治水一样疏导民众的需求,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sup>[5]</sup>,从而在道德许可的前提下臻至孟子的“可欲之谓善”<sup>[6]</sup>的境界,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sup>[7]</sup>说的是唯其敬德保民、敬天保民,才能得到上天的抬爱和扶持,使自己获得治理的权柄。所以作为地上的“天子”,必须恪守中华天命史观,做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sup>[7]</sup>。唯其如此,才会福祉绵延,江山永固。“行政”一词诞生于周公代成王“行其政事”的治理过程中。中国王道治理模式绵延不绝的秘密,就在于周公创立的这个密码。敬德保民和敬天保民是一个意思,都是有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而做出的治理理路的根本性调整。这既是西周统治者所得出的治理经验,也是后来积淀于君子仁人内心世界三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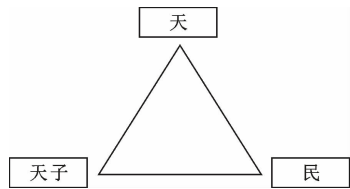


图2 王道正德存在论等边三角形结构图

德心灵秩序的深厚的存在论基础。

## 2. 达者之教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治理化转向

随着人的主体性不断提高,发轫于先秦儒家的“天理”概念,通过和汉儒大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的相互作用,西周时代产生的“天-天子-民”的哲学存在论就转化为“天理-国法-人情”这样一个治理模式,如图3所示。“天理”即天之道、天之理;“国法”就是王法,代表“天子”的意志;“人情”就是民情、民心、民意。类似于“天”必须体现“民所欲”这一点,“天理”的合法性在于要体现人情世故。体现了人情世故的“天理”就是“得天命”,也即“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中华天命史观的实质。“国法”来源于“天理”,以“天理”为最高准绳,而国法之“应天理”,也就是“顺民心”“应民意”。违背“天理”的“国法”,就成了恶法劣治;得民心的“国法”,就是良法善政。但在“人情”中也有容易膨胀的“私欲”,任由这种欲望泛滥,也会导致天下无序。所以,“国法”必须约束“人情”,尤其不能徇私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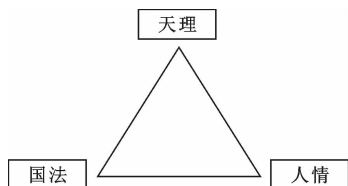


图3 王道正德治理模式等边三角形结构图

## 3. 达者之教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认识论表征

到了宋明时代,在陆王心学深化研究的基础上,上述君子仁人养成教育的“三达德”哲学存在论和政治理论基础就升华和内化为“良

知-良意-良情”这样一个认识论模式,如图4所示。这个认识论模式是基于物质关系的思想观念,即便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设置了制度设施,也仅仅是思想观念的物质附属物<sup>[8]</sup>。

进而言之,如果从认识论再转换成实践论维度,上述之“良知-良意-良情”的认识论模式就会转化为实践主体中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操作化模式,如图5。中国人常常讲做事要靠有理上,行为要合乎尺戒,生活需要热情,要懂得人情世故。依此3个方面行事,就是孔子说的“三思而后行”。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行事,就会在价值尺度上被他者认为“有理、有节、有利”。这就是三达德文化心理结构最后生成的价值评价性模式。具有这个“三有”品格的人,就是通晓事理、人情练达、敢于挺膺担当的人,即儒家眼中的“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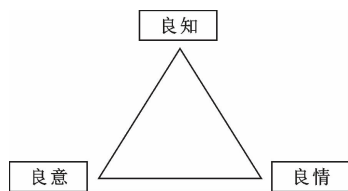


图4 认识论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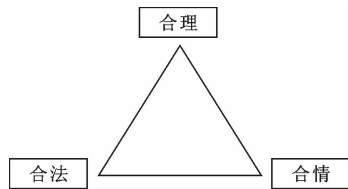


图5 实践论和价值论架构

## 二、正者之育：思政育人主体目标期待中的核心维度

### (一) 正者之育必须体认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三重内涵

政者正也,正政相通。我们认为新时代

正者之育的新锐劲枝是在几千年达者之教的深厚沃壤中孕育的。所以,就必须把这个土壤中所氤氲“正”的内涵进行简单梳理。不难发现,“正”一词具有三重意涵:一是经济层面。通过“乞醯与邻”的方式所体现的“给弱勢以应得”的“转移支付”义。二是政治层面。通过“行不由径”之操守所体现出的规矩意识。三是“子帅以正”和身先士卒向我看齐的“身教主义”。在此基础上所开枝散叶的最新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诉求。在这一全新语境下,通过立德树人所培养出来的人格特质,就是在人们心灵结构中生成的“使命-规定-任务”三维心理元素等边三角形框架,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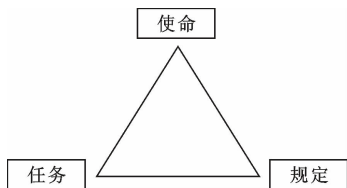


图6 实践主体架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sup>[9]</sup>使命,既是基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新天命、新大道这个存在论较为具体层面的实践论转换,同时它包孕着更为具体现实个人的生命活动。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被科学预测了的人类未来发展趋势即共产主义,这就是强大的客观事实,对这个事实的坚定信仰就是正念。汇聚和蒙正了这个豁然正念、正能量的信仰,就会积淀为“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主体世界的历久弥坚的信念。这个信念表现在每一个现实的个人身上,就是在熟稔和弘扬规定,明确和承担责

任所彰显出来的实干兴邦的信心。规定,即包括人的本质力量在内的激情发扬和理性提升在内的整全性规定。立德树人重要的价值遵循,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人之为人的规定为旨归。任务,就是在当下的实践中能够把握和解决的问题。了解这一环节,也是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备功夫。

## (二) 正者之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逻辑分析

第一,“有规定的”含义。有规定的即体现本质的。人的本质规定有三,即主体本质、关系本质、能力本质。主体本质有3个具体意涵,即人民主体本质、社会关系本质、主体能力本质。

人民主体本质亦有3个方面的具体规定,即实践主体、劳动主体、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具有3个属性,即自由性、自觉性、自动性。劳动主体也具有3个属性,即自主化、对象化、审美化。历史主体同样具有3个属性,即受动性、能动性、社会性。受动性根源于生产力的既得性和生产关系的先赋性以及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强制性。因此,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抬头。能动性产生于生产力的革命性、生产关系的选择性和思想文化价值关系的引领性和感召性。社会性就是集体主义的弘扬,就是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就是社会团结的形成,就是统一战线的打造。所以为了实现凝聚人心和求同共识的政治局面,一定的“价值结构”和核心价值倡导的建构就不能缺席。譬如政治目标的确定、意识形态的坚守、爱国情感的培育、创新精神的激扬、伦理道德的砥砺等。又譬如从国家、

社会、公民个人三元维度切入的一定的“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的确立,等等。

社会关系本质具有平等性、正义性、共赢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把消弭社会不平等和致力于基本人权平等以及给劳动人民和弱势群体以“基本应得”作为自己矢志追求的政治目标;一直把铲除自发性社会分工所导致的三大差别和致力于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一直把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一切人的发展和进步的主体目标。

主体能力本质分为人的激情、人的关切、人的理想。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3]</sup>他还说,如果我们的关系是人的关系,我们的世界是人的世界,我们就别无选择,就必须以诚信交换诚信,以关爱交换关爱。列宁也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sup>[10]</sup>。人的理想产生于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就在于,黑格尔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却认定,凡是合乎理想的,哪怕它一开始是弱小的,也会通过社会革命迟早变成现实的和强大的。所以,“承认理想的意图”“追求理想的力量”,对未来理想来说总是充满着火热的激情,就是人的主体能力本质的重要“规定”。由此可见,“有规定的”主要侧重在“情感侧”。

第二,“有使命的”含义。使命即人的使命,具体有天命、使命、生命3个规定。一是基于“两个必然”的“天命”认知,是人的实践使命顺利展开的前进方向和最高理想即共产

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所以,对一个立志干大事的接班人来讲,夯实理论基础从而获得“天命”并学会统筹决策至关重要。这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思想基础的奠基,政治经济学之知识内容的丰富和科学社会主义之现实路径的自觉。二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使命”践行,是把最高理想变成共同理想,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历史过程的必然途径。其中包括实践目标的确定、实践手段的截获、社会发展实践结果的“顶层设计”。三是基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命展开,也分为3个规定,即“本己”生命的落实,亦即职业生涯规划的实现,“为他”生命的充实圆满,亦即家庭生命周期的顺利完成,“形上”生命的升华,亦即人生价值崇高感的获得,即服务人民和奉献社会的兑现。唯有整合3个环节,才会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格局。不难看出,这种建立在“识大体”格局上的“有使命”的状态,带有鲜明的因小见大气质,这一气质昭示了“有使命的”这一元素在心理结构中的认知侧特征。

第三,“有任务的”含义。任务是道义当解、工具能解、现实未解、群众盼解的社会问题的实践议程之生成。基于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理论诉求<sup>[11]</sup>,我们就可以把“两个必然”中形成的“天命”意识通过实践中的“使命”意图转换成一定历史阶段当事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合约意向。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至于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行动纲领,这完全要以当事人所遇到的历史条件、客观形势、实践问题和现实

任务为转移。如果说“两个必然”使我们有了“国家实践”“整体实践”“师出有名”和问题当解的道义高度,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给我们从工具理性层面开出了问题能解的现实道路。而实践中的矛盾捕捉,又为我们设置了问题未解和问题必解的议事日程。直面问题,一方面需要杰出人物的“霸得蛮”的精神气魄、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和捕捉问题并进一步设置议题的决策能力,以及动员群众投入宏大叙事的情感调动能力;但另一方面,迎难而上的普罗大众却需要“耐得烦”的钝感力、艰苦卓绝和不息奋斗的经久不衰以及愈挫愈奋的意志力。因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列宁曾讲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总是知难而进的。他还说:“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起来或者惊慌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sup>[12]</sup>

### (三) 正者之育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心理结构的三维透视

如果说“规定-使命-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思政育人主体目标期待“正者之育”的存在论框架,其全民族整体性的实践论框架就是“方向-组织-力量”的三元一体、和谐匹配模式的横空出世。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和平崛起,有一个最值得总结的密码,这就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智慧和欲望分裂状态的扬弃<sup>[13]</sup>。这个密码信息简单地说,就是智慧和力量在组织和管理的统摄和规制下的高度整合。因为“理智无力,欲无眼”,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开创出民族的新生面。而代表这个

新生面并且元气充沛、活力四射的杰出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成果<sup>[14]</sup>。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撰写现代化剧本,由受过先进生产力洗礼,演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这样的社会团结所形成的历史性大潮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基本秘密<sup>[15]</sup>。作为历史实践进程中形成的客观架构总是有其被投射的心理基础的。所以,上述“方向-组织-力量”之客观架构,又可以用另一种主观架构来表述,就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三位一体。真理体现在综合中,又在实践中被创生出来。这就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目标期待,必须把三心之等边三角形架构之每一角都做齐做强。因为缺少其中任一个角,其他两个角都会走向反面。

### 三、结语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中庸方法论中“以合为思”理念的影响。本研究提出的“爱感优先论”,结合“达者之教”与“正者之育”的双重化培养路径,旨在扬弃“单向度”发展,整合知、情、意三要素,从而将学生培养成兼具智、仁、勇“三达德”与一身正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显然,智、仁、勇“三达德”与“正者”品格并非先天赋予,而是需要通过教育途径和个体自觉努力来达成。“以合为思”强调在贯彻“两个结合”方法论的过程中,重新强调“学”与

“思”的统一。孔子在“六言六弊”中指出“学思结合”对于养成“三达德”的重要性,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这说明,唯有在“爱感优先”的框架下,将智、仁、勇三者有机整合,才能克服愚、荡、乱等弊端<sup>[16]</sup>,构建起和谐、稳定、有序的文化心理结构。

社会唯名论认为,社会是由现实中的个人组成的。因此,“稳中求进”的社会发展总基调不仅适用于社会整体,也同样适用于个人在“社会控制”中能够健康成长的人生过程。因为只有当个体具备了这种和谐稳定的历史文化心理等边三角形结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才可能兑现为广泛而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心理支撑的历史活动。因此,我们坚信,只有深入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性方法论,彰显立德树人的双重化路径,在弘扬教育的思政引领力和守正创新中,才能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N]. 人民日报, 2012-11-18(1).
- [2] 孔子. 论语译注[M]. 杨伯峻,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5] 戴生岐. 人本社会学新论——基于马克思积极人道主义视阈[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6] 陈戍国. 四书五经校注本[M]. 长沙:岳麓书社,2006.
- [7] 尚书[M].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23.
- [8] 恩格斯. 反杜林论[M]. 钱铁如,吴理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0] 列宁. 列宁全集:第2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2]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3] 杨宇立. 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经济分析[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 [14] 周玉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82-94.
- [15] 黄河. 高校思政课强化“人民至上”理念的教学思路[J]. 高教学刊,2025(18):17-20.
- [16] 徐志明. 《论语·阳货》中的孔子形象[J]. 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3):110-115.

(责任编辑:杨海挺)